

主编 金冠军 戴元光

中国传播思想史

现当代卷

本卷著者 戴元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播思想史/金冠军、戴元光主编. —上海: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313—04004—0

I. 中... II. ①金... ②戴... III. 传播学—思想
史—中国 IV. G20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084 号

中国传播思想史

金冠军 戴元光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张天蔚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总印张:103 总字数:1943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50

ISBN7—313—04004—0/G·724 总定价(共 4 册):2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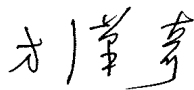
由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余志鸿、徐培汀、戴元光主笔的《中国传播思想史》正式出版了，这是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早在几年前我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讲学时，他们就提到正在编写《中国传播思想史》，我是积极支持而且乐观厥成的。这不仅填补我国传播思想研究的不足，还因为一个学科要发展，要提高，必须从基础抓起，新闻传播学科的基础就是史论。在新学科不断出现，人们都在研究新问题时，上海大学仍不放过基础研究，也是值得称赞的。

中国是十分重视“史”的研究的国家，历来把“史”作为学问对待。关于传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对新闻史的专门研究也有一百多年。19世纪中叶中国就有研究新闻史的论文，20世纪初已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论著。只是在“极左”的年代，中国新闻与传播史的研究受到重创。“文化大革命”以后，史的研究得到恢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公开出版的新闻与传播史学著作近两百部，论文以数千篇计，新闻与传播史研究专门家近百位。史的研究传统被继承了。

我国传播史研究已有100多年，但主要是研究新闻史。为什么呢？一是关于传播学的系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从外国传进来的，而西方传播业迅速发展之际正是中国与西方隔绝的年代，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低谷甚至停顿的时期。直到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才得到振兴和发展。二是中国关于传播思想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三是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缺乏研究传播思想的政治环境。

《中国传播思想史》对中国5000多年来传播思想做了全面的、多学科视角的、立体的扫描，具有深广的历史视野，其中不乏独到见解。我在感受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的同时，也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



2005年2月

主编絮语

这是一张中国传播思想的历史名片,又是中国传播思想的“写真”集——5000 多年来中国人关于传播的认知、理解和思想。

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可悲的是在古代专制主义下,我国传播业发展比西方国家要慢得多,特别是关于新闻传播的研究比起西方更为迟缓。

中国是十分重视“史”的国家,也十分重视“史”的传播。早在 2000 多年前就有对传播的深刻认知,19 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出现研究传播的论文,如 1873 年《申报》发表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20 世纪初,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论著。1949 年以后,中国对传播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只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传播的研究受到重创。“文革”后得到恢复,尤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涌现了大批专著和学术论文,新生了近百位新闻与传播史研究的专门家。但早期我国传播的研究主要是对新闻史的研究,有关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研究断代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研究传播思想的政治生态环境,研究新闻史相对较为安全。

在中国传播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言论自由和专制主义的剧烈斗争。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统治集团控制民间舆论的“监谤”制度,秦始皇发动了近乎消灭知识传播的“焚书坑儒”事件,隋唐以后历朝历代都推行控制传播而使知识分子尽入“彀中”的科举制度,宋元时期建立起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明代发生了残酷迫害主张自由言论的“东林党人”事件;清王朝时期,屡起“文字狱”,强化了控制传播的行政措施。现代以来,传媒飞速发展,但统治者对传播的控制丝毫没有松动。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新闻与传播学遭到空前绝后的扫荡。

尽管如此,中国传播业仍作为文明的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中国几千年一直处在古代专制主义和皇权皇威下,但传播思想仍不断出新,传播思想家启蒙家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并隐约折射出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为我们研究历代传播思想提供了丰富的

依据。

《中国传播思想史》驻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语境,全方位对中国传播思想进行一次系统而完整的精神清算,这不仅是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个交代,也是为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寻找精神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书是对几千年中国传播思想的全面而综合的检阅,力图构筑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又是在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学术构建。

我们写作的思想导向是:

一、多学科视野立体表现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丰富内涵

古代的传播活动范围较窄,古代文化人对传播的理解也跟现代人的学术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古代文献使用的传播术语完全不同于现代传播的概念,因此对古代传播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就如大海捞针,从渺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采集古人的传播思想精华,在中国文化与现代传播理论的交叉点上进行解读,表现中国古代邈远精深而又不确定的传播思想。

人的传播“与生俱来”。从人的第一声啼哭开始,人就开始传播。人类的言语、行为,包括人自身的思维、人际间的交流以及生存追求下的生产、生活、战争等活动,都具有传播的性质,甚至蕴涵着深刻的思想过程。但是,作为自觉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则是在人类组织成社会,并规划自己的言语和行为时才发生的。

神话、巫术、原始艺术、原始战争,以及早期文字的创造,是人类幼年期传播思想发动下的传播行为。原始人类在东方世界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创造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源于原始求知欲的神话传播中出现了的创世神盘古、女娲,文化神伏羲、大禹,英雄神黄帝、炎帝和蚩尤等,以及经过长期的无数次的部落战争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终于形成了华夏族,并创造了流传千古的汉字。汉字的创建意味着华夏民族从自发的传播行为进入了自觉的传播活动。我们从汉字所蕴涵的文化要素可以窥探中华民族传播思想的萌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观念,便是中国古老传播思想的见证。商周之后汉字逐渐摆脱巫术的阴影控制,从人神传播的工具衍生为人际传播和公共传播的主要工具,这是中国传播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

春秋战国到先秦时期是中国上古传播思想的总结阶段,诸子百家活跃的思想里到处闪烁着传播理念的火花。孔子的“正名”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

说、荀子的“约定俗成”说、墨子的“三表”说、惠施的“齐多为一”说等,都是对人类的第一传播——言语和文字功能的最精彩的传播思想的总结,而且在老庄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了“道”和“器”的传播概念。至两汉时期,史学传播、儒学传播和黄老思想得到很大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的诠释学和字(词)典学取得巨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如《帛书》中“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的提法,已经归纳出封建体制传播的基本原则;王充强调“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的观点,是对内向传播的形象概括;贾谊提出的“制服之道”,便是对人际等级符号化传播的杰出论述;一代大儒董仲舒在“名”和“物”关系上提出了“号”的传播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儒学传播思想的发展和成熟。特别是在东汉时期对汉字的隶化和造纸的发明,传播手段的进步推动了中国传播活动的飞跃进步。

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从本质上把中国教育传播推向了新的高度。春秋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传播思想,还只是儒家的理想追求,但是到了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却使之成为中国全社会的最广泛的传播实践。唐朝的繁荣昌盛和强大,是政治传播和军事传播的硕果。《贞观政要》所阐发的“兼听则明”思想已是传播千古的格言,陆贽“言者不壅,听者不劳”的观点是对言论自由的永远记录。唐代的儒学虽然平平,但是古老的易学有了新生。邵雍所谓“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的天人同一性观点,融会儒道两家的传播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启迪了宋元理学传播思想的生发。

两宋时期受到北方民族辽夏金三国的侵扰,国内阶级矛盾激烈,社会动荡不安,但是民间书院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空间。宋元明时期的儒家学说发展起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以宋陆九渊、明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理论。朱熹理学主张“格物致知”的传播思想,陆九渊和王阳明心学则相反提出“致知格物”的传播思想,二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知”与“行”的关系。这里特别应指出,宋元明时期的印刷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蒙元时期是中国古代传播史上又一次自由传播的活跃时期,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族际传播的大发展,加速了中国各民族的“华化”,为现代北方话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儒道佛思想的大融合,并且出现了景教、萨满教、喇嘛教、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等多元宗教共存共容的大传播;三是繁荣的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使宋元理学取得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崛起了新型的文艺传播形式——元曲和元杂剧。元朝和明朝是中国古代走向世界的传

播时期,这一时期出了两位伟大的传播活动家,一位是来自西方的马可·波罗,一位是远涉重洋比哥伦布、达·伽玛还早上百年的郑和。中国的造纸、印刷术传播到了海外,引发了世界性的传播技术革命。随着物质传播的发达,汉字和汉文化也传输到了整个东南亚,汉字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东南亚的通用文字,也促进了这些国家模仿汉字创造自己的文字,从而形成了一个至今还发生影响的“汉字文化圈”。

明代值得一提的是,邸报的成熟发展。中国在唐代就出现了“新闻”这个词语,虽然它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概念,但是新闻传播的雏形已经出现。先秦时期的《尚书》,汉代的《史记》等记录当朝史实的文献,可以说已跟“新闻”有所关联,到宋代邸报已经流传相当广泛,明代甚至在邸报上已出现了像冯从吾写的《做人说》等涉及新闻传播的文章。邸报是中国早期新闻传播的特有形式,至于顾宪成以联句方式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口号,可以说正是中国早期新闻传播的理想追求。

二、驻足现代文明检视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中西交流图景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和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精神。近代报刊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舶来品,与古代中国的邸报并无继承关系。习惯上中国近代新闻史,以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创办第一份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开端。故本书近代卷以此为起点,至 1915 年《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为终点,共 100 年。近代传播思想的梳理与研究从纵横两方面入手。纵的方面,主要阐述 1815 年开端的西学东渐的传播思想,如林则徐、魏源等的传播思想,太平天国洪秀全、洪仁玕的传播思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早期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的传播思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的传播思想,以及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郑贯公、秋瑾、于右任等的传播思想和民初新闻人士黄远生等的传播思想。横的方面,主要视野是政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教育传播思想以及文艺传播思想,重点是新闻传播思想与政治传播思想,着力塑造传播思想大师的“群像”。

在论述近代传播思想时将洋务运动思想的传播列为专章,因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推进近代化过程的初始阶段。我们必须区分洋务派代表人物的功过与洋务运动的功过。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动机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但也有抵御外侮的一面;同时,兴办民用企业,又有利于发

展民族资本主义与提高生产力的积极一面。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屠杀太平军、捻军,确是不折不扣反人民的专制者。另一方面,曾国藩、李鸿章首倡洋务运动的功绩不应抹煞,他们兴办近代化工业,组织人员翻译西方书刊,派遣留学生赴欧美留学,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办学、兴医、办慈善事业,主观动机是为西方国家殖民主义政治服务的,但客观上起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开发民智,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近代传播思想史上,义和团反洋教,事出有因,但盲目排外并不值得歌颂;太平军起义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虽然未能摆脱封建主义传统意识的羁绊,但是大大促进了新的政治经济因素的产生,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虽未能实行,但凸显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思想闪光。

太平天国运动的传播思想充满了矛盾:既有平等意识又有特权主义,《天朝田亩制度》反映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幻想,而其建国立政方略又完全是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一方面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天国中制造特权阶层、专制独裁。洪秀全在建国时就立儿子为幼主,同时颁《幼学诗》,其中《朝廷》说“生杀由天子”,《君道》说“王独操威柄”,《夫道》说“规章道本于刚”,《妻道》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完全于平等意识相背离。

从1815年到1915年的100年,中国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四个历史阶段。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众政治觉悟的发展过程,标志了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救亡”压倒“启蒙”。为了救亡图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很不成熟的状态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它的经济基础薄弱,缺少政治经验的储备;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维新派与革命派,尽管开头锐气逼人,声势颇盛,但究竟敌不过强大的帝国主义与顽固的封建主义势力,近代化任务没有完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艰难而痛苦的转折时期,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严酷现实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应该说,近代中国面临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半殖民地化,这是历史的倒退;另一种趋势是腐朽的封建社会逐步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以及自觉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不断产生。后一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

础的生产。”^①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西方列强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同时,不得不将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的生产、交换手段和管理方式移入中国,将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中国,迫使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因此从总体来说近代中国是在深受列强压迫和封建势力束缚的情况下艰难、曲折地前进着,而不是倒退。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只作了短暂的逗留,中国并没有真正走上资产阶级革命派预设的民主共和轨道,反而倒退到四分五裂和军阀割据的局面中。民主共和难以落籍的原因何在?其一是民族资本主义基础薄弱,无力支撑共和国大厦。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难以得到正常发展。经济力量的弱小和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特殊环境,又决定了资产阶级政治上十分软弱,容易妥协。其二是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封建势力盘根错节,造成中国素无民主传统,只有专制的承袭。其三是近代以来,思想启蒙不足。其四是缺乏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同盟会虽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这只是个理想,缺乏真正实现的方法与途径。不解决土地问题,就难以发动农民,难以得到农民的支持。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是在西方文明感召下追求“民富国强”和自由思想的历史,是在“西学”启蒙下进步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民主与自由,改造中国传播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群像”,是遭受列强侵略从失败悲剧中逐渐觉醒而寻求拯救中国的理论探索。

三、以大众传播为入口梳理历史重构现代传播观念

20世纪对世界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世纪,也是令人焦虑和惆怅的世纪。对中国来说也如是。最近的一百年,传播媒体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传播媒体的武装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从平面媒体到电影,到电视,到多媒体,到互联网,到数码媒体。传播媒体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极致,但却面临精神(思想、哲学、信仰)的匮乏与缺席。就是说传播思想发展滞后于传媒的发展。

20世纪初,西方传播思想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注入了新鲜营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报刊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传入中国,使中国传播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与自由主义传播思想是两个完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48 页

不同的思想体系,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主流,但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传播,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谱系,给中国人以思想和精神的选择。这个事件的意义是中国开始接近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潮。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西学和马克思主义同时在中国寻找生存的价值,古老的中国土地上释放了民主的气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数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悲剧落寞,马克思主义得到推崇。

虽然我们有幸迎头撞上 20 世纪,但历经劫难。在相当长的一些年代里,中国不仅拒绝现代传播思想,甚至拒绝前贤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传播哲学观,中国传播学界一度陷于精神荒原之中。在 1966 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经历了断裂和迷失,比起全世界,“中国的精神年表已空前紊乱”,传播学界更是“四顾茫茫,一无凭藉”。^①“文革”结束后,中国传播学界又一次发现自己与世界同辈巨大的精神差距。

现代传播学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关于人的传播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设,却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传播的认知非常深刻,职业传播在世界上也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传播思想曾对世界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明清以来,我们落伍了。

当代中国有 2000 多家报纸,2000 多家电视台,8000 多种期刊,有世界上最大的受众群和传媒市场。我们应当在传播领域有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系统理论,应当建构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为了这些,也就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所以,现代传播思想研究从民初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以及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的先驱者入手,找寻中国人传播思想及理念的现代源头,全面总结 20 世纪初以来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基本学术立足点和研究重心就是 20 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面貌及走势。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在清除“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同时,实行举世瞩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传播学者们才又开始新的跋涉,这是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书中对中国传播学的整体的历史命运洞若观火,其中对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传播学者甚至每一部传播学专著以及每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的综合评析,那就更是让人感到如入学术宝库,满眼金

^① 张育仁. 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2 页

光灿烂了。

既然是学术专著,当然就不能是简单的“结算清单”。所以,《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描述,而且又有大量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的重新评价和创新观点,甚至对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些西方重要传播理论都有严格的新的思辨。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现当代卷既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又特别提出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认为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它的统治之下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比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之下要多一些或多得多,这也是一般的客观事实。但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史和传播史都证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所保护和保障的自由——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

《中国传播思想史》从2000年着手构想,2001年开始撰写,前后五年,数易其稿,终告杀青。

研究中国传播思想难度实在很大,不仅时间久远,跨越不同时代,对传播的认知也不一。要在浩瀚的文字中建立研究框架,其难度可见。方汉奇先生讲他是难耐寂寞写文章。这是大师的境界。而我们要从林林总总的历史人事和汗牛充栋的故纸堆里理出头绪,建立框架,很费时间与心力。

研究中国传播思想另一个难度是对传播思想的界定很困难。为此,我们多次请专家出主意,几经修订,以至定稿前又邀请赵玉明、丁淦林、罗以澄、张俊德、吴廷俊、单波、吴信训、张咏华、许正林、郑涵等专家再次讨论,广泛听取建议,并根据专家意见再次进行纂修。

本书所讲的传播专指人类社会信息的流动,传播思想则是关于人类社会信息流动规律的概念、认知、理解和把握。由于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没有或较少有专职传播机构和专职传播人员,对传播现象的专门研究还不够,鲜见有专门的传播思想家,传播思想散见于不同文献中。因此,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涉及范围较为宽泛,一字一句都是爬罗剔抉寻觅出来的。

近代以来,传媒发展迅速,专职传播机构很多,专职传播人员队伍很大,传媒成为导引社会的重要力量,人们对传播的认识已较深刻。现代社会,传播不仅是社会的公器,也是经济行为和商业行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因此,近现代传播思想的研究着重围绕人们对大众传播规律的认识来展开的。研究视野较为深广:从纵的范围来说,主要阐述1815年开端的西学东渐,外国传教士的传播思想、洋务派的传播思想、维新派的传播思想、革命派

的传播思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的传播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及命运,1949年后中国传播思想的发展和变化等。从横的内容范围来说,作为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思想史论,主要包括政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教育传播思想,重点是大众传播思想。

考虑不同时代传媒发展和对传播的不同认识,也为便于表述,本书由四卷构成,采用编年史的顺序。古代传播思想部分分上下两卷,上卷从上古到魏晋南北朝,下卷从隋唐到清乾嘉时期。古代部分分两卷并不表示古代传播思想的分期,只是因为容量的关系。而近代和现当代部分则各为一卷,从容量看也较合适。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 190 余万字四卷本书稿,不仅是我们执笔者的成果,其实更是对几十年来许多专家研究成果的消化和再梳理,企图更清晰地勾画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四卷本著作是众多学者的共同成果。

一些专家建议,不管本书是否成熟,可以先出版,树个“靶子”,然后把专家请来,让大家七嘴八舌。这个主意不错。现在呈献给大家,以抛砖引玉。

目 录

第一章 民初传播业和传播思想	1
第一节 民初传播的政治与文化生态	1
第二节 民初传播业的短暂繁荣	8
第三节 民初传播思想的学术积累	13
第四节 西方传播思想的传播及影响	22
第二章 现代先驱者的传播思想	37
第一节 传播自由学术思想的短暂高涨	37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与传播研究	40
第三节 蔡元培：“上以督促政府，下以指导社会”	51
第四节 李大钊“使命”观和民彝主义	55
第五节 陈独秀：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家	63
第六节 邹韬奋：为了大众属于大众的传播观	70
第三章 五四时期传播思想的嬗变	80
第一节 西方传播思想的传入与中国传播观念的变化	80
第二节 五四运动与《新青年》	8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早期的传播	92
第四节 五四时期重要传媒和传播思想	100
第四章 现代传播思想研究的启蒙	108
第一节 徐宝璜：“供给知识”与“代表舆论”	109
第二节 邵飘萍：“品性为第一”	120
第三节 戈公振：“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	124
第四节 传播思想研究的分流	131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的影响	134
第五章 自由传播理论与实践	154
第一节 自由传播与民办传媒	154
第二节 《申报》与史量才：“经济独立”、“言论中立”	159
第三节 《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164
第四节 范长江：“报纸是政治的工具”	168
第五节 储玉坤：“报纸是社会的灯塔”	172
第六章 毛泽东传播思想	181
第一节 毛泽东早期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	181
第二节 毛泽东传播思想的三个来源	185
第三节 毛泽东传播思想的理论内涵	188
第四节 邓小平对毛泽东传播思想的继承	190
第七章 传播思想研究的曲折与艰难	196
第一节 新中国传播思想和传播政策	197
第二节 刘少奇的传播思想及对传播政策的影响	209
第三节 陆定一的人民报刊传播思想	212
第四节 政治运动中的传播思想	216
第五节 传播理论的困惑与传播业危机	220
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对传播科学的扼杀	224
第七节 传播研究的转折	229
第八章 屡遭困厄的当代传播思想家	242
第一节 王中：传媒“是宣传工具”也是“商品”	244
第二节 徐铸成：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	249
第三节 储安平：报刊是“共同说话的地方”	256
第四节 甘惜分：传媒是社会舆论机关	260
第五节 方汉奇：传播者要有“学术良知”	262
第九章 当代西方传播学的传播	266
第一节 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	266

目 录

第二节 西方传播学的传播	276
第三节 中国人对西方现代传播学的最初认知	281
第四节 传播学研究的深化	292
第五节 迅速发展的传播学应用研究	312
第六节 传播学研究中的不同观点	326
第七节 传播观念的嬗变	356
第十章 传播学研究的转型	376
第一节 新媒体理论	376
第二节 传媒新经济思想	404
第三节 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415
第四节 传播学的价值重构	438
后记	455
主要参考文献	457

第一章

民初传播业和传播思想

20 世纪以来是世界传播业飞速发展的世纪,也是中国传播业飞速发展的世纪。大众传播媒体从单一的报纸、杂志等发展到有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传播的质量今非昔比,传媒的高科技日新月异。技术改变了传播,传播改变了世界。但这个“改变”也是在充满忧患和艰难险阻中渡过的。

100 多年前,当人们揭开 20 世纪第一页的时候,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怀着扑朔迷离的复杂心情,中国人尤其是如此。

100 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令人有点后怕却又不无骄傲与自豪的历史,并进入又一个百年时,中国传播学人的心情依然是错综复杂的。

第一节 民初传播的政治与文化生态

当我们讲起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时候,人们不免会首先想到和讲到中国的远古文明以及悠久的华夏文化、万里长城、四大发明,这些都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但一旦谈起近现代,谈起 19 世纪、20 世纪,人们便摇头叹气,不无遗憾。

一、“维新”时期中国传播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中国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但 2000 多年来中国人始终没有跳

出传统文化的框框。

从 1840 年起的一百多年,中国没有完成从传统文化向现代科学文化的过渡,虽然在这一段时间,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绅士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开始了在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外国传教士也在中国办学校,印刷报书刊,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妨害了中国人民接受西方文化的热情。

1895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专制的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清朝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使中国“国之不国”,清廷内保守派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反对研究西方政治与文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①可见,这时期中国政治与文化生态是复杂多变且极不稳定的。

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的耻辱,在加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也唤醒了许多中国人,清廷内较开明的君主在事实面前不得不采取某些明智的措施,促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爆发了“百日维新”运动。维新变法失败了,中国人却被进一步唤醒。但是,外来文化与政治思想的传播,需要一定的人文与政治的背景,人民也需要认知的过程。在清末,清政府对内实行“文字狱”,对外闭关自守,社会没有活力。人民刚刚接受西方文化,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资产阶级民主制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外,^②“广大群众在观念上都还没有产生重大变化。所以在 19 世纪末,一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到处奔走呼吁,唇敝舌焦,号召变法,指出:‘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却提出了‘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的口号”。^③

1900 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动摇了清王朝的自尊与自信。1901 年,为缓和国内外矛盾与冲突,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王朝不得不实行“新政”。“新政”虽是清王朝挽救没落统治、欺骗人民、取悦外国人的不得已之举,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民主的成长。

比较而言,1906 年清王朝展开的“预备立宪”活动,对中国传播业的发展

①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卷 47, 24 页

② 陈炽. 庸书外篇卷下. 议院

③ 史全生. 中华民国文化史.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4 页